

Where 东方主战场

武汉：配置要素市场 闯出“红色”机遇

■ 本报记者 王莹

78年前的“七七”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点。78年后的7月7日，这天上午，在石门峰纪念公园武汉抗战纪念馆内，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拉响抗战时期的防空警报器，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及中国的各界人士和学者、市民一起参观抗战文物，重历1938年“保卫大武汉”的壮烈历史画面。

日军意欲在此决胜

武汉，一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城市。清王朝洋务运动中在此兴办了第一批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大门，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关键一枪，点燃了中国走向共和的燎原之火。这里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第二大城市，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1938年6月13日，日寇朝武汉狼奔豕突而来，认为占领武汉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由此，“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也辉映着“武汉会战”的战火硝烟。自开战以来，日本国内经济状况日益紧张，日本政府迫切需要早日寻求一场决战战胜中国，而日本政府则认为，武汉就是其一直要寻找的决战场。日本政府认为占领了这里，中国将会放弃抵抗，因此通过御前会议决定，调集兵力，迅速攻破并占领武汉。

1938年6月，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规定了战略方针。中国政府充分地认识到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军队无论火力、补给还是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无法与敌人相提并论，一举战胜日军绝不可能。

战事从1938年6月11日开始，一直战至1938年10月27日，战火延及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省，经数百次大小战斗，中国军队在付出40万伤亡的代价后，毙伤日军20余万（中方统计）。

负责攻打武汉的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在1938年的日记中写道：“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虽然武汉会战最终以中方失败、武汉沦陷结束，但是日军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打击，再也无法发动诸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大型会战，被迫转入保守的战略方针，就此，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建“资本特区”

7月20日，武汉召开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动员大会，提出了一揽子政策以推动创新、创业，并提出城市发展新目标。

7月22日，长江众筹金融交易所（筹）、长江大数据交易所（筹）、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众创空间交易所（筹）和武汉陆羽国际茶业交易中心等五大要素交易平台，在武汉光谷资本大厦同时揭牌。武汉光谷对要素交易市场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自2011年启动“资本特区”建设以来，科技金融发展步入快车道，已形成了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为主线，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功能，推动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科技金融产品创新的科技金融发展格局，要素交易平台呈井喷式发展趋势。

截至目前，东湖高新示范区已集聚了银行、证券、保险、小贷、担保、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机构600多家。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和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9家要素市场先后落户运营，业务发展迅速。

下一步，武汉还将积极推动国际珠宝玉石交易中心、体育产权交易中心、矿业权交易中心、华中电交易金融服务平台等新型要素市场的组建。

“光谷”光耀世界

7月25日，汉版中关村创业大街——“光谷创客街区”，在第18期光谷青桐汇上惊艳亮相，成为武汉打造创新型城市的急先锋。该街区从光谷资本大厦开始，直至世界城步行街德国风情街。作为科技金融+消费服务类孵化基地，比肩北深，华中首席的光谷创客街区将吸引全球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集聚高端创新创业服务要素，孕育产生关键颠覆性创新的功能中心，还将实现旅游、购物、休闲、阅读、住宿、交流等多个生活功能，打造国内首家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经过战火洗礼的武汉，而今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全面出击，遍地开会。

关东光电子产业园、关南生物医药产业园、汤逊湖大学科技园、光谷软件园、佛祖岭产业园、机电产业园等园区各具特色，2000家高新技术企业分类聚集，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能源环保、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机电一体化和高科技农业竞相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国际市场占有率12%；光电器件、激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40%，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坐拥世界顶级产业园区的智力优势，依托光谷资本大厦和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在光谷核心区的物理空间资源，如今创立的“光谷创客街区”，在建设过程中，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总体思路。在东湖高新区的指导下，参与主体运营的三家公司，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发动创业家在创业服务、创新服务、产业促进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共同打造创新创业生态。

Who 抗战中的企业家

胡子昂： 建抗战的“钢铁”后方

■ 晋珀 郭婕

胡子昂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工商业人士和民主人士。在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秉持实业兴国的理念，坚持实业救国的道路，力争将重庆和四川建成抗战的“钢铁”后方，义举传为佳话。

少年壮志，爱国忧民

胡子昂（1897—1991），原名胡鹤如，字子昂，1897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府巴县南城坪镇。少时就读于巴县中学（即今重庆实验中学），此时正逢辛亥革命，胡子昂深受其影响并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19年，胡子昂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就读，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3年毕业后，胡子昂回到四川，相继担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和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

1925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近千民众伤亡，千余间民房被毁，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万县惨案”（又称“九五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胡子昂作为重庆各界的代表，携款前往万县慰问抗英军民，并以文字、照片等形式，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6年，29岁的胡子昂转入军界，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并任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他带领川康交界的各县群众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并减轻赋税，一时政绩卓越，广受好评。

实业救国，支援抗战

20世纪30年代，日军对华开始大肆侵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胡子昂反复思考，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于是，他毅然辞去军队的官职，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漫漫征程。在当时，四川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黄炎孙创伟业，众志成城振中华”，胡子昂觉得，必须将四川建设成“钢铁”后方，中国的抗日战争才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1932年，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胡子昂毅然“加盟”。1935年，胡子昂指导华西兴业公司改建了自来水厂，达到日产水量可供30万人需用的规模，解决了山城市民世代爬坡上坎挑水上山的历史。接着，他们又在重庆南岸创办四川水泥厂，在江北创办了华联钢铁厂，为重庆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们又在成都创办了自来水公司，使自来水业务向全川扩展。

1938年5月，胡子昂等人提出扩建华联钢厂，使之达到年产30万吨成为后方最大钢厂”的设想。胡子昂“国民政府投资入股民企、产钢支持抗战”的呈文，获得了国民政府的许可。

1939年7月，官民合资的中国兴业公司（简称中兴公司），在重庆江北香国寺正式成立（华联钢铁厂归并中兴公司），官僚资本占股80%，胡子昂只能任副总经理。随后，日军侵占武汉，长江航线中断，大后方物力艰难，钢厂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为此，胡子昂四处游说，八方奔走，并亲自招待客商，衔接重要业务，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致力民主，民建先贤

胡子昂一生爱国，对民主建国孜孜不倦。

无论是受辛亥革命影响、参加五四运动还是后来的实业救国，无不以此为宗旨。抗战时期，胡子昂就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多有接触。尤其是1941年在重庆白象街工商人士座谈会上听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后，使他茅塞顿开。从此，他常去上清寺的“特园”作客，多次聆听周恩来的讲话。期间，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密切交往，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成为民建的创始人。

抗战胜利后，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议会不挂中国国民党的党旗，表现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鲜明立场；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被攻占后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刊。

1949年9月，胡子昂先生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951年，他将其经营的所有企业股票和房产等全部无偿交给国家，全家老小三代人在公房里居住，靠工资生活了几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子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直思考国家工商界人士应怎样继续为国民谋福利。1979年1月，他与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应邀到邓小平家里做客，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贡献智慧。

胡子昂曾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名誉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殚精竭虑。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战争罪魁



武汉抗战纪念馆

When 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七

减租减息——从民生经济到民主经济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最终获得了成功。

从政治方面来看，“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既不是一党专政的，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而是一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经济上，在敌后根据地，1940年到1942年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减租减息。

从社会发展角度讲，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从旧的封建的社会性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194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地民众也动员起来了，经济也发展起来了，群众抗战积极性也高了，军队也

多了起来。

可以说，通过减租减息，发展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经济改革为1945年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找到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途径。后来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农村建设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共产党实行的这些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改革，从更深层次讲，既解决了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一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转型的改革。

1931

1939

1940

1942

1943

1945